



中國銀行(香港)
BANK OF CHINA (HONG KONG)



百年中銀 与您同行
A CENTURY OF SERVICES, ALWAYS WITH YOU

中银香港的奠基人贝祖诒

贝祖诒，字淞孙，江苏吴县人，1893年（清光绪十九年）生。贝家为吴县商业世家，富甲一方，贝祖诒自幼受其家庭影响，对经济商业事务兴趣较多。

投身中国银行

少年时代的贝祖诒，在乡读私塾，接受的是传统教育。1903年，贝祖诒前往上海，入澄衷中学学习。1907年，自澄衷中学毕业后，考入家乡苏州东吴大学中学部，进入高中阶段的学习。1911年毕业后，又进入河北唐山路矿学堂学习了两年。如此，贝祖诒接受了较为系统的现代教育，为他以后的职业生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13年，贝祖诒重回上海，担任汉冶萍煤铁公司驻上海办事处的会计。1914年3月，贝祖诒进入中国银行北京总行担任司账，由于他勤于职守，努力钻研业务，很快即成为一名业务中坚。1915年，贝祖诒调入中国银行广东分行，先后任代理会计主任、总会计师兼营业部主任。为适应工作需要，更好地与当地打交道，贝祖诒到了广东仅用了几个月的时间，即学会了一口流利的粤语。

1917年9月24日，中国银行在香港设立分号。1918年，贝祖诒前往香港负责相关工作。1919年2月，香港分号改为分行，贝祖诒担任经理直至1927年，成为中银香港的主要奠基人。他在香港分行经理任上，最大的成绩在于扩充国外汇兑业务。当时，美国的纽约、芝加哥、旧金山、檀香山，美洲的加拿大、墨西哥，东南亚的新加坡、暹罗（泰国）、菲律宾、安南（越南）等地，每年都有大批华侨的收入需要汇回国内。为了争取这一部分客源，香港分行积极改善服务，改革取款汇兑的手续和方法。同时，针对不少侨胞文化水平低的情况，同意凡属不能签字者，准其画「十」字为证；凡侨胞不愿携带现金回乡者，可代为委托批局转解。上述举措效果显著，更多的侨汇通过中国银行香港分行转汇国内。中国银行香港分行像一块巨大的海绵，吸收了大量外汇资金，获利丰厚，成绩显著，成为当时侨汇转汇内地的枢纽行。1924年3月，贝祖诒因「经营有方，扩充国外汇兑增利不浅」，受到中国银行总管理处的表彰，并「从优加薪」。

支持国民革命事业

贝祖诒在广东和香港任职期间，正值孙中山南下护法，组织南方革命政府，与北洋军阀相抗衡。贝祖诒密切注意局势发展，提出相应对策，并与孙中山南方政府中的财政要员宋子文等保持着较好的

私谊。

1923年2月，孙中山领导的军队击败陈炯明的部队，孙中山重回广州，建立陆海军大元帅府，继续革命事业。同年12月20日，孙中山下手令给中国银行广州支行，将广东盐务稽核分所前存税款11万元交给分所所长宋子文，并由陈友仁出面向会计主任索款。广州支行从中行一贯的财务制度出发，拒绝提付。双方关系恶化，大元帅府一度下令通缉广州支行行长。直到1924年8月1日，孙中山任命宋子文为广东中央银行行长。中国银行派福建中行副行长舒石文和总管理处张宗英出面，向宋子文等进行疏通，双方关系才得以缓和。

宋子文担任广东中央银行行长后，广州市面金融混乱，中央银行因缺乏准备金而滥发的纸币毫无信用，造成兑现竭蹶、通货膨胀、罗掘俱穷的现象。宋子文为扭转这种不利局面，提高广州中央银行纸币的信用，曾咨请广东省政府出示布告：「凡一切交易款项出入，对于广州中央银行纸币应一律通用，并随时持向该行及兑换所兑换，现已设兑换所两处，并委托八家银号为代兑机关。」为了筹备充足的现金，防止出现无法兑现的情况，宋子文派人至香港，向贝祖诒拆借部分现金。贝祖诒不敢擅自做主，秘密电告身在北京的中国银行副总裁张嘉璈请示。张嘉璈密嘱贝祖诒前往广州，与宋子文面谈，帮助广州中央银行整理纸币，并藉此机会联络感情。

贝祖诒与宋子文见面后，宋子文向贝祖诒提出借款200万元，贝祖诒答复说：「二百万元不是个小数字，我做不了主。这样，我先借给你五十万元先用，待请示总行张副总裁嘉璈同意后，再续借。」宋子文见贝祖诒是个爽快人，彼此有较好的印象，双方很快便由业务关系转为朋友关系，贝也因此而在以后成为宋的亲信干才之一。广州中央银行得到这笔现金后，作为准备金，用以整理金融，其发行的纸币才逐渐得以流通。1926年7月，当国民革命军正式出兵北伐时，广东中央银行行长宋子文电令出发各部队：「我军达到各地，当加意维持中国银行」，表示了对中国银行的支持。

1927年4月，国民政府在南京建立，初时，所辖地域有限，经济来源不多，筹备各项用款颇为困难。蒋介石恣意向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借款，而上海分行经理宋汉章是个职业经理人，一切照章办事，与蒋产生了矛盾与冲突。中行总经理张嘉璈认为：「宋经理对于总司令部军需处借款事，既按银行向例作风应付，引起双方不快。诚恐此后应付新政府人物，难免不再发生类似情事。我颇有调香港分行经理贝祖诒任沪行副经理，协助宋氏之意。会宋经理忽患神经衰弱重疾，极需静养，自专任常务董事，因调贝祖诒继任。」1927年7月，贝祖诒调任中国银行上海分行经理，并在此岗位上坐了十八年。

贝祖诒上任后，与南京国民政府保持了和谐的关系。自1927年4月至1928年6月，南京国民政府共发行国库券与公债13,600万元，均由银行界先行垫款，然后再发售，其中以中行上海分行所占比例最大。

宋子文出任南京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后，以中央银行作为国家最高金融机关，而将中国银行改组为「政府特许之国际汇兑银行」，并将中行总部从北平迁往上海。1928年11月17日，中国银行第十一届股东会在上海召开，600多名股东到会，会议选出商股董事12人，贝祖诒首次成为董事。会后，贝祖诒出任中国银行总行业务部主任，同时兼上海分行经理。

事业爱情两得意

中国银行的性质改变之后，国际汇兑成为主要业务。1931年底，中国银行实行新的组织大纲，贝祖诒身兼国外部与信托部经理，成为中行的重要负责人之一。

1931年的夏季，贝祖诒以考察欧美银行名义远赴欧洲，在伦敦泰晤士河畔，偶遇18岁的蒋爱玲。当时难得在异国他乡遇到中国人，何况两人一开口交谈，皆为吴侬软语，原来两人还是同乡，便有说不完的话，遂结伴同游。贝祖诒年近不惑，正断弦待续。蒋爱玲开学在即，正准备返回法国，贝祖诒立即赶到巴黎，向蒋爱玲求婚。蒋毫无思想准备，再加上两人年龄悬殊，犹豫不决。

原来，蒋爱玲的父亲蒋履福是个外交官。1930年4月，南京国民政府任命蒋履福为中国驻意大利代办，同年6月，蒋履福偕家眷到任。途径法国巴黎时，父亲将蒋爱玲留在当地一所天主教女子中学读书。在学校放长假的日子里，蒋爱玲到欧洲各地旅游，结果在伦敦邂逅贝祖诒。爱玲的姐夫唐在均，时为中国驻德国汉堡领事，闻讯后夫妇两人赶赴巴黎，但意见无法统一，最后决定请蒋履福前来定夺。或许是蒋履福与贝祖诒有缘，见面后颇有相见恨晚之感，当即许婚。贝祖诒与蒋爱玲的婚礼，遂在中国驻法国公使馆举行。婚后不久，新婚夫妇回到上海。

20世纪30年代中期，贝祖诒积极参与、推动了中国的币制改革。中国向来以白银为货币，所有的银两由民间自由熔铸，重量与成色以及与其他货币的换算比率都没有统一规定。南京国民政府为了统一并垄断金融，必须统一货币的发行权，而要实行货币的统一发行，则必须实行废两改元。在这个问题上，中国银行为了自身业务的发展，也一直推动政府实行废两改元政策。

1932年7月，财政部部长宋子文与钱币司司长徐堪分别到上海，召集银钱业代表讨论废两改元问题，同时组建了一个废两改元研究会，由中国银行贝祖诒和外国银行代表及专家等七人组成。该研究会的英国专家穆叔脱认为：中国近期实行废两改元的时机不成熟，须待十年或二十年之后，等到新银币准备充足才能实行。贝祖诒则就立即实行废两改元的必要性和重要意义进行了论述，并批评了穆叔脱的观点。此外，贝祖诒还对外国银行和一部分钱业界代表怀疑实行废两改元后，可能滥铸银元和滥发纸币并担心银元供不应求等等顾虑，一一进行了解释。贝祖诒代表中国银行声明：中行对发行纸币准备进行公开检查，决不滥发纸币；而且库存银元充足，随时可供应市面。

币制改革的关键是需要货币汇价稳定，而汇价稳定的关键，在于有足够的汇兑基金。1934年秋，贝祖诒和李铭在上海与汇丰银行磋商，希望得到汇丰银行的借款或贷款，藉此来支持银本位的市场。汇丰银行经理也希望借款成功，使中国能够保持自由银本位，但因借款须得到英国政府的同意，而英国财政部对此不抱信心，借款谈判暂时停顿下来。之后，宋子文和孔祥熙都曾向美国提出贷款，并打算将银本位改变成与美元联系的新币制，但也遭到美国国务院的反对。国民政府在借款不成、售银有限的背景下，迫于国内金融形势，决定独立进行货币改革，并得到英国政府的支持。美国对法币与英镑的联系深感不安，遂提出以法币与美元挂钩等条件，收购中国的白银，以增加法币的外汇基金。

1935年11月，国民政府的外汇基金只有3,000万美元，实行法币政策以后，出售白银换取外汇，增加了外汇基金。法币与英镑、美元实行固定汇率，中国银行、中央银行、交通银行三行可以无限制买卖外汇，使法币对外汇价基本趋于稳定。

1937年「七·七事变」后，中国的抗日战争全面展开。8月13日，日军进攻上海。根据财政部指示，中国银行总管理处迁往南京，同时在香港和汉口设置总管理处驻港办事处和驻汉办事处，国外部及信托部随同总行驻港办事处一并移设香港，总行大部分处、室均移港办公。按照中行章程原规定：中行只设总经理一人。随着战争继续，行务日趋繁重。1938年4月，为适应战争形势需要，中行决定增设副总经理一人，由贝祖诒担任，同时仍兼任上海分行经理。国民政府为了大力吸纳民间闲散资金，推进小额储蓄，决定扩大储蓄网点。宋汉章和贝祖诒从香港致函各分行经理，要求从速着手筹备，积极进行，并于1941年4月制定了《中国银行筹设简易储蓄处办法纲要》，规定各分支行处，应选择相当地区，呈准总处筹设。到是年年底，中行新设简易储蓄处64处。此项措施对抗战起到一定的作用。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中国银行驻港办事处人员陆续撤回重庆。1944年，贝祖诒以中国代表身份出席在布雷顿森林召开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会议。

出任中央银行总裁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此时，宋子文已出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长，作为宋的亲信，贝祖诒于1946年2月26日被任命为中央银行总裁。

战后中国经济面临着复兴重建的艰巨任务，宋子文衡量形势，决定实行金融开放政策，同时决定以中央银行库存黄金为基础，以官定价格通过上海黄金市场买卖，借此回收过量发行的法币，吸取民间游资，稳定通货，并给金融开放政策以有力支撑。1946年2月25日，国防最高委员会通过开放外汇市场的决议。3月1日，贝祖诒到央行走马上任，专心处理买卖外汇和配售黄金事宜。3月4日，国民政府行政院宣布实施《管理外汇暂行办法》、《进出口暂行办法》等一系列重大措施，将法币外汇定价定为1美元合法币2,020元，指定中外二十七家银行及少数行号经营外汇买卖。

贝祖诒上任之初，国共和谈正在进行，外汇法定价格与黑市价格相差不多，外汇供应比较宽裕，再加上黄金配售，中央银行拥有外汇资金约8亿多美元，黄金600万两，还有大量的敌伪产业以及美军剩余外资和联合国救济物资，可以随时运用，使得外汇市场比较稳定。但到了1946年7月，内战全面爆发，外汇市场形势逐步恶化，外货涌进，民族工业难以与之抗衡，濒于破产。经宋子文首肯，8月19日，贝祖诒将外汇汇率提高到法币3,350元对1美元。消息一出，国内外舆论大哗。

外汇汇率第一次调整后，不但黑市外汇水涨船高，物价也跟着大幅度地上涨。宋子文、贝祖诒迫不得已，只有大量抛售黄金，最多时一天抛售10万两，以稳定黄金官定价格。1946年12月，售出黄金78万余两，1947年1月，售出黄金67万余两。宋子文、贝祖诒还修正了进出口贸易办法，企图减少外汇供应。然而，外汇供应越少，外汇黑市价格越高，套汇、逃汇之风愈烈。到1947年2月15日，中央银行因库存黄金接近枯竭，不得不宣布停售黄金。

上海黄金风潮爆发，导致经济危机，引发全国社会动荡，舆论哗然，宋子文因而成为众矢之的。3月1日，国防最高委员会决议，行政院长宋子文辞职照准，由蒋介石兼任行政院长；贝祖诒中央银行总裁的职务也由张嘉璈替代。

贝祖诒自中央银行卸职后回到中国银行，继续担任副总经理。1947年8月，陈光甫辞去中行常务董事一职，由贝祖诒接替。1948年，贝祖诒任中国技术代表团团长，前往美国，商谈有关争取美国援助问题，但没有结果。此后，贝祖诒定居美国，曾任美亚保险公司董事长、纽约斯泰公司顾问。1954年以前，中国银行仍为他保留了董事席位。1962年，贝祖诒出任香港上海商业银行董事长。1973年退休，结束了他的银行家活动，此后定居纽约。

张嘉璈对贝祖诒曾有这样的评价：「贝为中国银行家，亦为国外汇兑与国际金融专家。一生为中国银行及国家财政金融服务达三十五年，而以在中国银行时间最久，计三十三年。中国银行国外汇兑业务之创办与中国银行改组为国际汇兑银行后，其地位之确立与业务之扩展，贝氏贡献甚大。中国币制于1935年改为法币及抗战期间法币之维持一切措施，贝氏参与协助，尤着功勋。」这是对贝祖诒为中国民族金融业所作贡献的中肯评价。

1982年12月27日，贝祖诒在纽约逝世，享年89岁。

(载于《大公报》)